

“魏特琳的叩问”

——评《侵略战争与性暴力》

陈丽菲

最近得到了日本社会评论社 2002 年 6 月出版的新书《侵略战争与性暴力》，阅读以后，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从所能得到的资料可知，作者津田道夫，日本著名的评论家，也是日本以独立精神撰写历史教科书、与日本教科书审查制度进行 30 余年斗争的历史教育学家永三郎教授的得意门生。数十年来，他在历史、哲学、文学和政治等领域进行研究和评论，均有建树。1995 年，津田道夫先生曾出版《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东京评论社 1995 年版），这本书我虽无缘得见，但仅看书名，就令人肃然起敬，因为在目前，拥有 1.2 亿人口的日本，敢于直面历史，特别是敢于公开在书名上写上“南京大屠杀”5 个字的，已属于凤毛麟角。此后他又出版过《你知道“教育敕语”吗？》（东京评论社 2000 年版），对日本右翼不断祭出充满军国主义意识的“教育敕语”进行严肃的批判。

津田道夫先生的《侵略战争与性暴力》全书共分 5 章。首先值得介绍的是这本书的前言“魏特琳的叩问”。明妮·魏特琳女士（1886—1941），中文名华群，美国人，1912 年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伊利诺大学，同年秋，受基督教联合会的委派，到合肥督办教会学校三育女中。1919 年，她到南京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教授，并担任了教务主任、代理校长。津田道夫指出，除了少数几位战争历史的研究者外，在日本没有多少人知道明妮·魏特琳女士。事实上，当

日军占领南京时，明妮·魏特琳女士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活跃成员，南京大屠杀期间，她所倾力保护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0年改名）躲藏着万余名中国难民，其中多数是中国女性。明妮·魏特琳女士在日军的毒爪下勇敢地挺身而出，面对日军的各种威胁甚至殴打也毫不屈服，她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被南京人称为“活菩萨”。然而，勇敢的明妮·魏特琳女士在此后的岁月里，却整日陷入痛苦的记忆折磨之中，她无法忘记日军制造出的那么多的没有任何人性的屠杀和强奸、堆积如山的尸体、光天化日下轮奸，甚至于她的狗那一天竟叼进来一个中国小孩的头颅！这种痛苦的记忆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去，反而在战争继续残酷进行的环境中变得越发清晰，文明与野蛮在她心灵中所造成的激烈冲突，使得明妮·魏特琳女士得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1940年同事们送她回国治疗，1941年5月14日，她终于选择了自杀，来解脱人世间的苦难。在明妮·魏特琳的墓碑上，人们刻上了“金陵永生”四个字，以为永久的纪念。魏特琳女士留下了相当大篇幅的日记，特别是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她的详细记录，更是日军屠城的铁证。目前，这一珍贵的日记，已被整理出版。津田道夫先生在他的前言中引用了魏特琳日记中写给“日本有良知的人”和“日本的妇女们”的一段话：“从军事的观点看，对南京的进攻也许是日本军人的胜利，但是，如果用道德法律来评价的话，这是日本的失败、国家的耻辱。这一事件，不但将会长久地成为和中国的友好关系的障碍，而且，还将失去现住在南京的人们的永久的尊敬……把目前在南京发生的事实，让日本有良知的人们了解，难道不是一件重要的事吗……日本的女性们如果知道了如此不堪的事实，那将会感到是怎么样的耻辱啊！”这就是“魏特琳的叩问”。她的“叩问”引发一批日本的有良知的人们，凭借着魏特琳们留下的史料，川流不息地来到中国，来到南京，在努力地了解历史的真相，并宣传历史的真相。津

田道夫先生以魏特琳女士的事迹和日记来开始的这本专著,就是在相隔60年时空之后,对“魏特琳叩问”的一个真诚回音。而这也正是我们正视日本民族良知的基础和这本专著的根本价值所在。

津田道夫先生的这部专著,从各个方面讨论了日本对中国侵略战争时期的日军性暴力问题。第一章对战争状况下的性暴力和强奸问题进行了论述。他首先介绍了联合国小人权委员会麦克唐纳的报告《武力纷争下的有组织的强奸和性奴隶》,指出国际法在性暴力问题上的最新进展,然后叙述了日军在中国实施强暴的记录和证言。他尤其详细地记录了在东京出席的“究明南京强暴事件集会”的亲身经历。1998年12月13日,他亲眼目睹了两位来自南京的战时被日军强暴的老人的血泪控诉,一位当时只有8岁,另一位只有7岁。他认为,会议上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的报告和日本老兵铃木良雄的证词也非常有说服力。在这一章里,作者还指责了战争结束时在柏林所发生的集体强奸事件以及战后冲绳发生的美军对日本女性的强暴。

在第二章里,津田道夫先生特别检讨了加害士兵们的精神状况,其中以《东史郎日记》为重点作了解析。作者尤其详细论述了东史郎因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载而进行的这场官司。作者严肃地指出,根据东史郎的日记,从上海到南京的“进军”中,日军已在进行屠杀;在严酷的行军—战斗—驻扎—行军的苛刻行动中,日本士兵充满着不安与恐惧,屠杀和强暴就是这种精神状态的必然结果。东史郎因公布记录战争的日记而遭到日本保守势力的刁难,是“非常遗憾”的。随后,作者介绍了另一本书《性与侵略——84个军队慰安所,原士兵们的证言》,该书记录了亚洲各地原日军士兵在慰安所的经历,是非常珍贵的口述史料。津田道夫还引用了小野贤二等编辑的《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第13师团山田支队士兵阵中日记》等所记录的大量的日军屠杀与强暴的铁的事实,

指出日军中“慰安妇”的普遍性。这一章中所录史料之珍贵、探讨的态度之严谨,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尊敬的。

第三章集中探讨作为强奸场所的慰安所问题。作者从两性的伦理、人类的性生活史出发,然后分析战时日军在慰安所对性奴隶们的暴力和非人道,并介绍了韩国、中国和日本方面对“慰安妇”幸存者所进行的缜密调查。这一章显示了作者比较宽阔的社会学视野,有一些对婚姻史、性史的追述,特别是对日本女性地位的法律资料的提供,对我们讨论日本的军队性奴隶制的形成和出现,具有启发思考的意义。

第四章的题目是“天皇社会与对中国、中国人的蔑视”。作者回顾了日本近代天皇国家的形成过程,指出,在甲午战争战胜了昔日的老师中国之后,整个日本朝野便日益嚣张起来,连小儿们也唱着“日本的男儿拿起村田铳,宝剑的锋芒直指那支那少爷兵,我们的士兵向各地进军,打倒那可恶的支那人啊,去夺取那万里长城”。在天皇制下的日本,对中国的作战叫作“膺惩暴支”,而这种情绪由于在“八一三”淞沪战役中因遭到中国军队的强烈抵抗而更加的焦灼,从民间的青年团、工商会议所、国防妇女会、处女会到学校到处弥漫着惩罚中国人的情绪。这种普遍地对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歧视和敌视,认为中国人不是平等的“人”的非理性观念,导致了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上的肆无忌惮,因此,日本士兵们甚至认为,在战场强奸中国女人并不是犯罪。这使我们看到,军国主义是怎样地戕害着一个民族的理智;而这种戕害,目前在日本仍然在继续着。我想日本的读者们在读这一章内容的时候,应该会产生警示的感觉,而在一定的意义上,对中国人也一样。

第五章的主题是现代文学中所描述的战时性暴力。津田道夫先生指出,在当时的氛围中,日本的战时随军的记者和作家们所写的战争报道充满着征服感,但也有据实报道的作品,然而,这样的

作品毫无疑问是要被日本政府所禁止的。作者列举了石川达三的《生存着的军队》，它是石川作为中央公论社的特派员的随军作品，1938年发表后立即被禁，理由是有反军倾向，危害时局。到了1945年秋日本战败，作品才得以全文发表。津田道夫先生在60年后重新估量了这部书稿的价值，特别是摘录了书中有关性暴力的描述，以为本书对性暴力讨论的一个佐证。同时，津田道夫以严肃的笔触，批判了混淆“慰安妇”问题性质的《春妇传》。

最后，作者专辟一节“历史篡改派想像力的贫困”，对南京大屠杀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观点鲜明地提出：历史不容篡改，不要把问题的讨论纠缠在数字上面，南京大屠杀决不是一个数字的问题。在后记中，他更进一步尖锐地提到了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天皇社会”的价值批判问题。以我们对目前日本社会的了解，可以想见津田道夫先生可能受到的社会压力，这更增加了我们对这样一个有良知的日本知识分子的由衷敬意。任何一个民族，总是知识分子阶层，不论在多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提供着可以开阔民族视野、更新民族生命的思想资料。在日本，尽管有石原慎太郎这样的右翼政治家，但我们知道，也有像津田道夫一样的有良知的学人在反思，所以，“和平”以及“进步”不仅是中日人民关注的话题，也是两国人民经过努力而可以达到的愿望。

（作者陈丽菲，1959年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编审）

（责任编辑：刘兵）